

中国崛起：对概念运用的探讨¹

[美]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 陈喜娜 (Sheena Chestnut)

内容摘要：当前有关“中国崛起”的论述，在何谓“崛起”以及如何量度崛起的问题上是非常模糊的。对于“崛起”的不同定义和指标最终会使人们在中国是否正在崛起，中国崛起的速度有多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何时出现这些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分析中国崛起时缺乏严密性会产生切实的政策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关于“崛起”的六种定义，并初步探讨了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将如何影响中美外交政策选择。

关键词：中国崛起 政策影响 中美关系

如今，几乎没有人对中国正在崛起表示怀疑。但问题是，当前有关中国崛起的话语 (discourse) 中，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分析人士，在何谓崛起以及如何评析崛起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非常模糊的。在分析中国崛起时缺乏严密性会产生切实的政策影响。有关崛起的不同定义和指标最终会使人们在中国是否正在崛起，中国崛起的速度有多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何时出现这些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反过来，这些问题又会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产生影响，继而会对中国自己如何应对外界的反应产生影响。

实际上，按照不同人所论及的有关“崛起”的不同定义和指标，中国要么是

[美]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美] 陈喜娜 (Sheena Chestnut) 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生。

1 此文源自江忆恩201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所做的一次演讲，更详细的版本请见 Sheena Chestnut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Rising?" in Eva Paus, Penelope Prime, and Jon Western, eds., *Global Giant: 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因技术原因，译文对原文使用的部分图表做了不影响文意的适当删减。

尚未崛起，要么是正在崛起并正在赶上美国，要么是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从美国和中国媒体、智库和政策圈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至少六种关于“崛起”的定义。

一、历史性 (Historical) “崛起”

有关“崛起”的一种定义是从历史的角度界定的。也就是说，与它的过去相比，特别是在大约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力量已获得显著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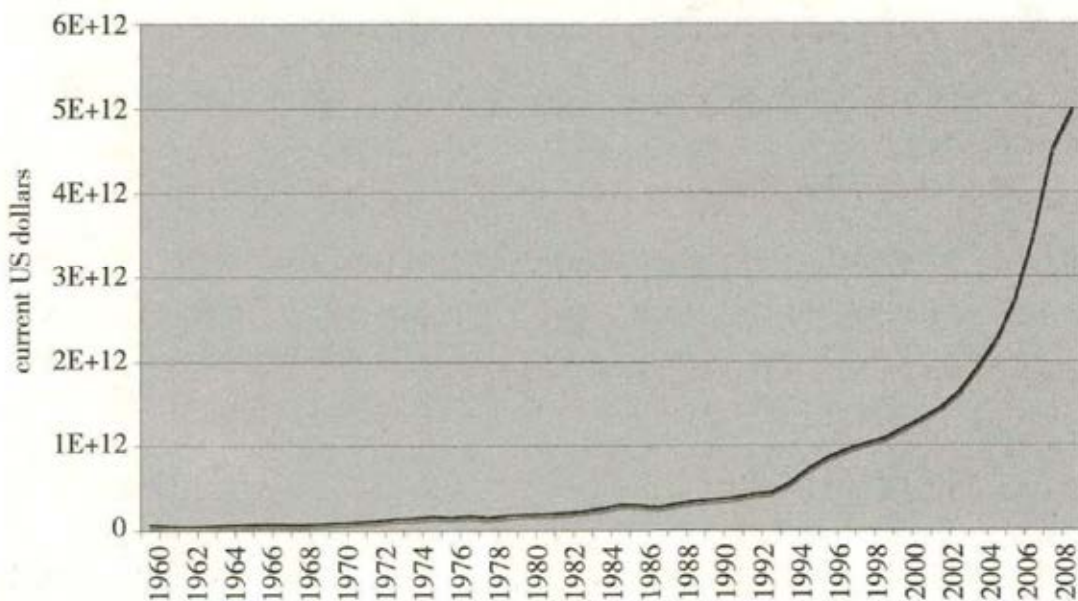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GDP增长情况(来源:世界银行,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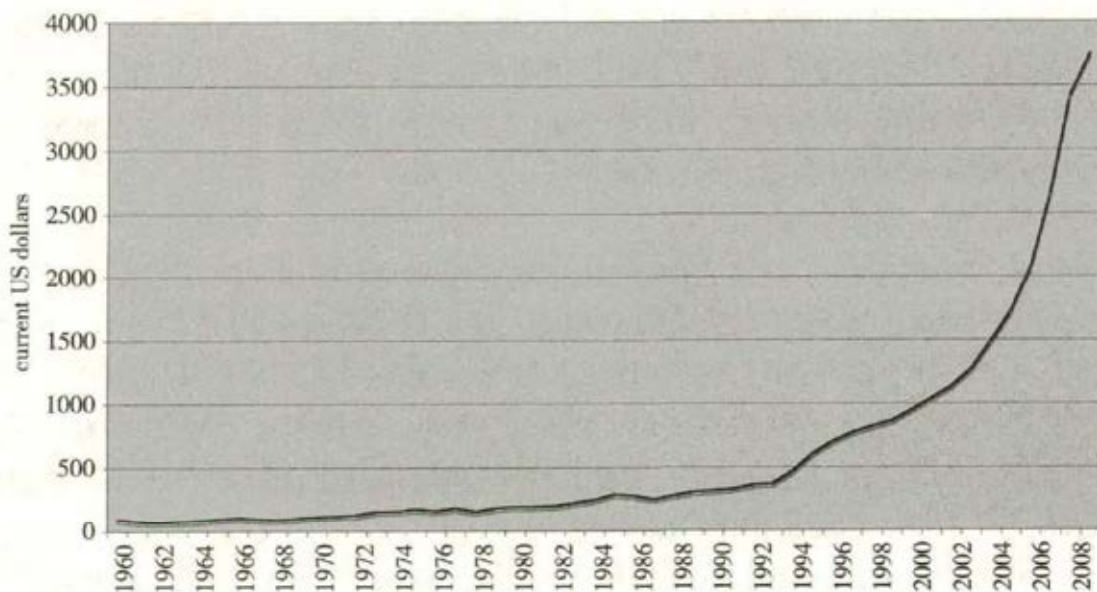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人均GDP增长情况(来源:世界银行,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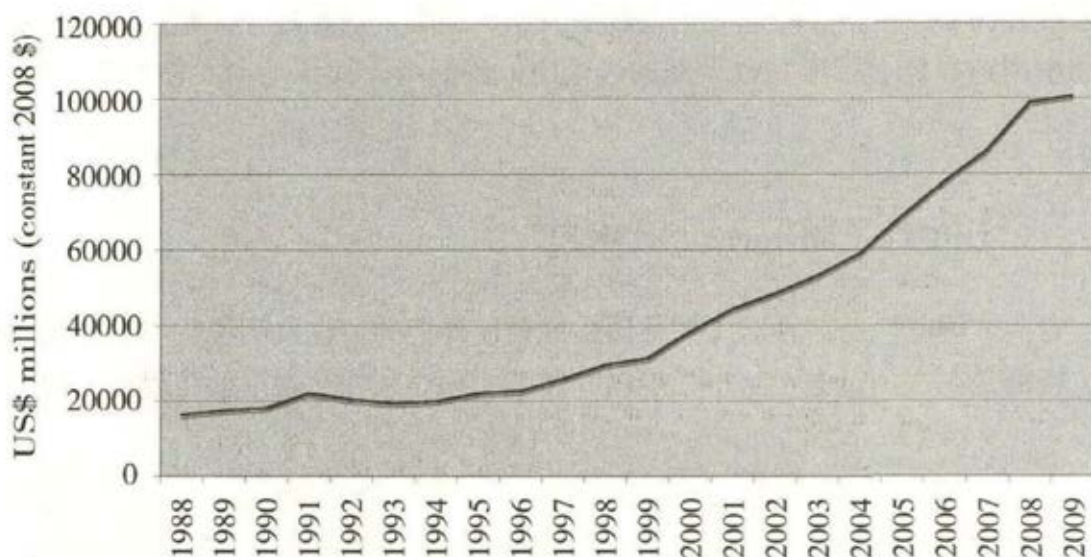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0）

如图1、图2、图3所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军费开支在过去十年中呈现指数性增长。或许，至少从物质角度而言，“历史性崛起”与“复兴”（rejuvenation）这一概念的意思最为相近。

二、能见度（visibility）

对于崛起的第二种定义与国际体系中的能见度（visibility）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presence）显然已得到增强。关于能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对国际机制的参与水平。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在国际上主要的政府间组织中的存在大幅提升。在这些机制中，中国的能见度也得以提升。图4显示，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既作为控诉方也作为辩护方。中国作为第三方涉诉的案件数量也已显著增长。此外，中国大幅地增加了它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中国高层领导在世界舞台上露面的次数也比以往多得多。¹

然而，尽管有关能见度的许多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对于国际机制）的参与度也已增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能见度仍然是有限的。比如，总体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数量与其他国家，甚至是那些较小、更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显得有些逊色（图5）。此外，虽然国际上对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活动的关注在增强，但从投资所占股份或生产能力方面而言，中国的石油公司并非主要玩家（图6）。

从中国民众的能见度来看，显然，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中国公民赴海外旅

¹ 张清敏、刘兵：“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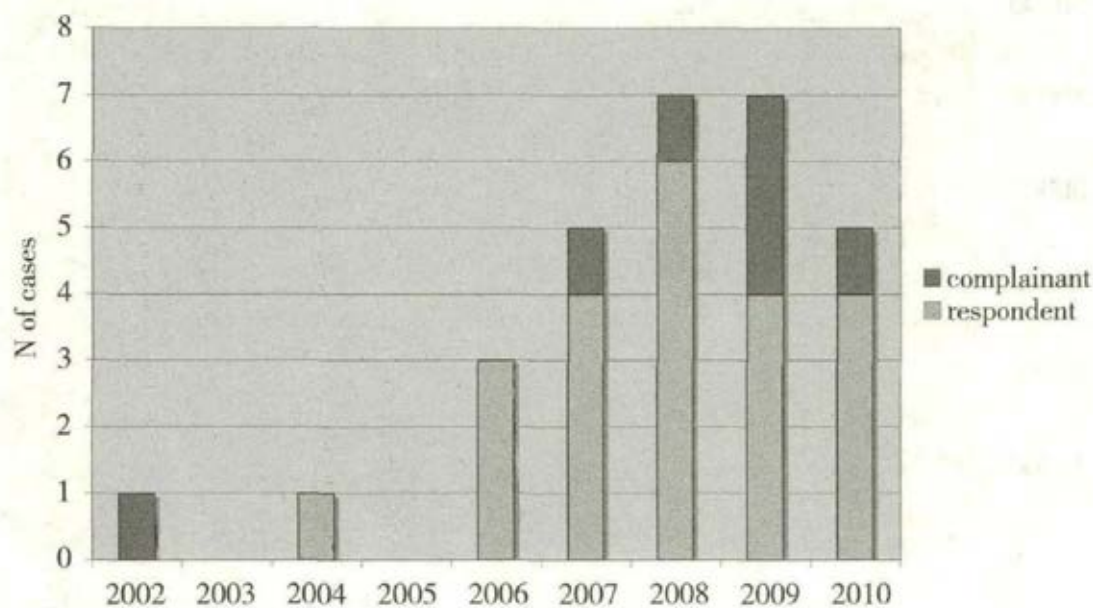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与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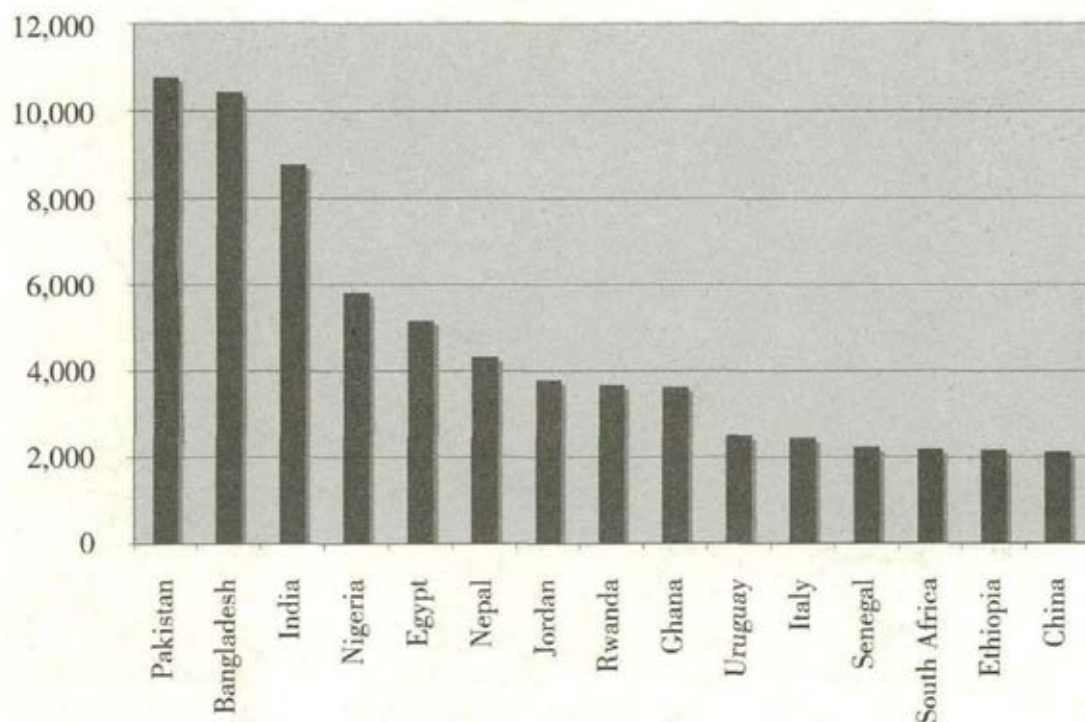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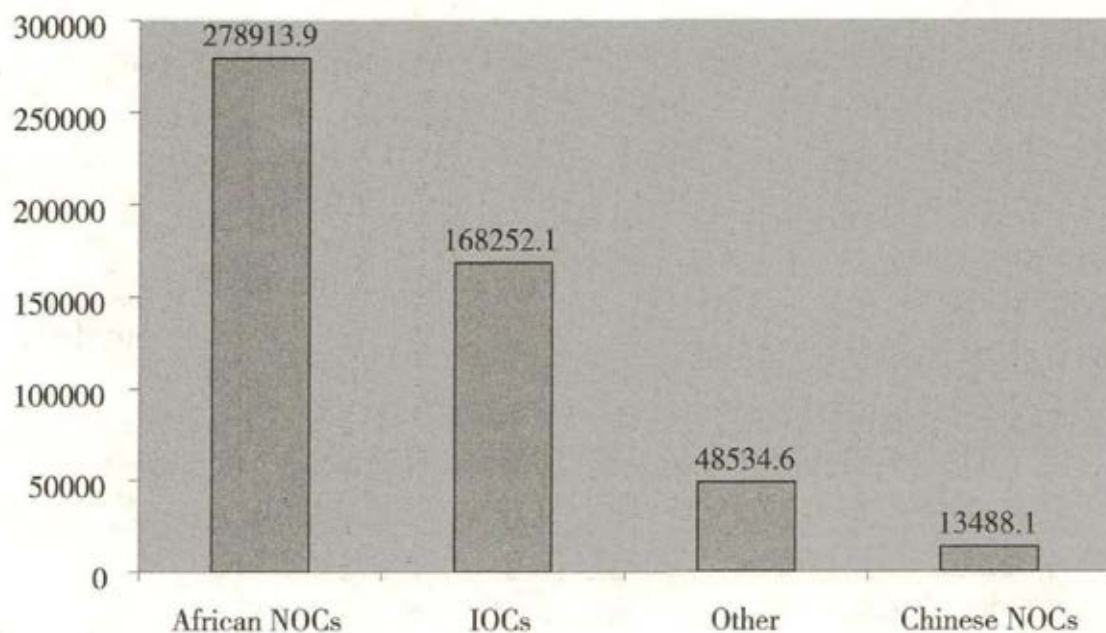


图5 2009年各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数

游，他们所去的国家也比以往更多。比如，图7展示了到访美国的中国公民数量的增长，图8则展示了赴东南亚旅游的中国公民数量的增长。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出国的中国公民数量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访美的中国人占本国总人



Source: Wood Mackenzie, March 2007.

图6 中国公司在非洲石油投资的商业总值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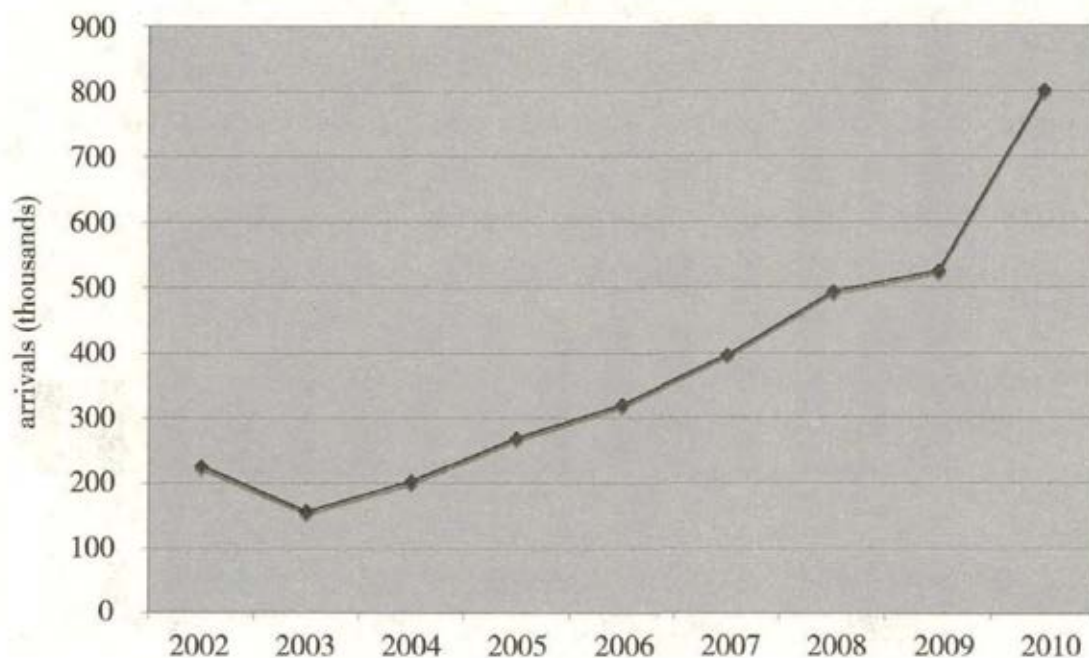


图7 2002—2010年中国公民赴美人数

¹ 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China-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3:3, Summer 2007, pp. 42-68.

口的比例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英国相比是非常小的（图9）。到访东盟国家的中国人数，与东盟国家间的旅行人数及从其他国家到访东盟国家的人数相比，仍然是非常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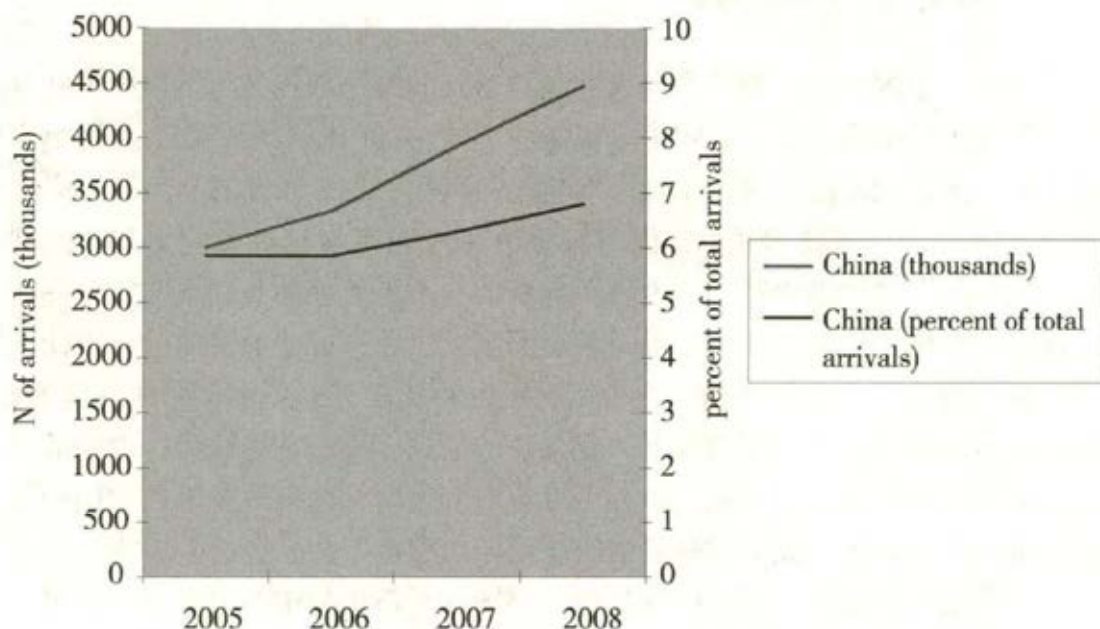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公民赴东盟国家人数（来源：东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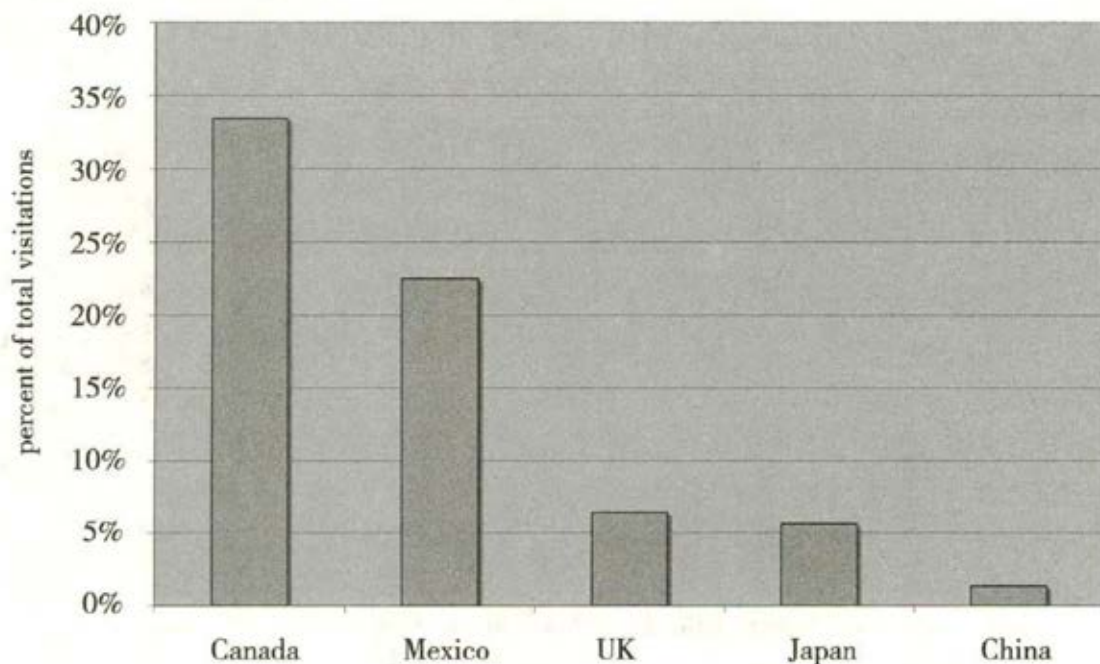


图9 2010年中国赴美游客在主要游客来源国中所占的比例（来源：美国商务部）

在此，我们想强调一个重要观点，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表明的，这个观点

对于理解人们如何认识崛起有重要影响。很简单，对于崛起的评析不仅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指标，也取决于人们选择的是相对指标还是绝对指标。

三、影响力（Influence）

在有关“中国崛起”的话语中人们经常遇到的第三个定义与所谓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有关。影响力是很难界定的，人们经常会将权力和影响力相混淆。从一般性的用法来说，影响力常与非强制性手段（如说服、“胡萝卜”）而非物质上的胁迫或强制相联系。但是，要想在A国对B国的影响力和两国利益的“自然”趋同之间做出区分，也是不容易的。不可或缺的是，人们需要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能够看出，中国对某个国家发出了积极或消极信号，以使该国按照中国所愿来行事，而该国则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在这些案例中还应能看出，中国的胡萝卜和大棒使该国领导人改变想法的证据。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影响力至少在周边地区获得了增强，但几乎没有研究表明，如果缺少来自中国的带有说服性的姿态和政策，做了某些事情的该地区国家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有关影响力的另外一组指标就是在主要国际经济机制中的投票权。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与“能见度”定义相类似的一个问题。即，虽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在增加，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但从相对指标来说，中国在投票权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将美国盟国和具有相近意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投票权加起来，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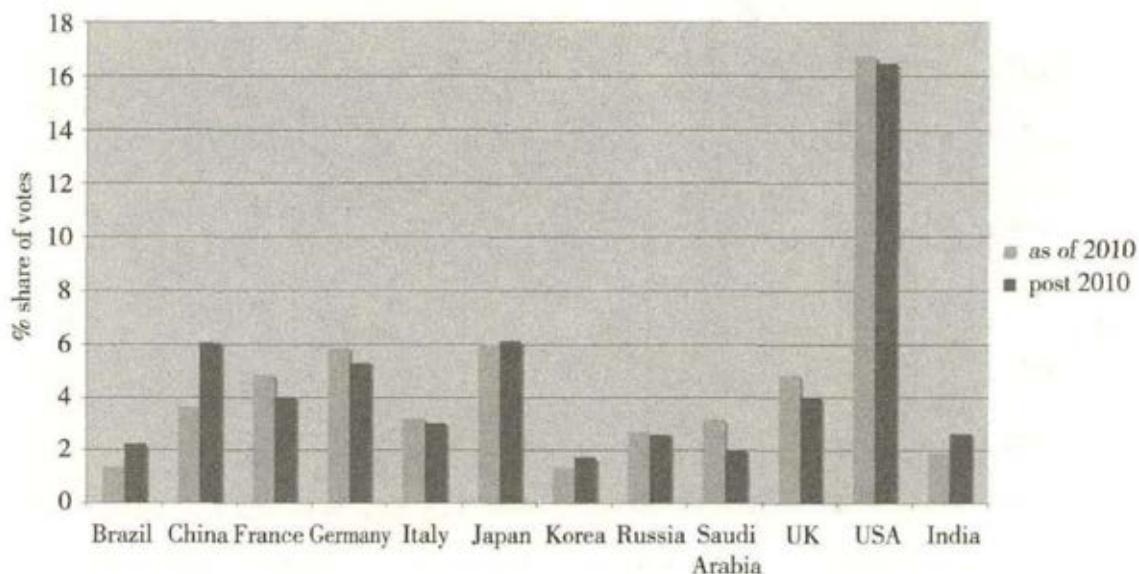


图10 IMF中各国投票权的变化

近年来，“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概念，用来描述所谓非强制性说服或

吸引,通过这种说服或吸引,软权力的被施加者会按照对软权力的拥有者有利的方式改变它们的偏好(或行为)。

然而,软权力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正如贾尼丝·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所言,软权力实际上也是具有胁迫性的。拥有软权力的行为者具有马特恩所说的“表征性力量”(representational power),¹即软权力界定了在某个问题上什么才是具有正当性的表述,从而使其他某种声音沉默下来,或是将某种声音排除。

其次,有关软权力的因果关系也没有被很好地界定。使用这个概念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提出有关说服和/或吸引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套理论。对于A国的文化输出品(时尚品、食品、娱乐品等)如何导致B国对外政策偏好或行为发生改变,他们并没有提出立得住的理论或证据。虽然人们可以设想美国式快餐销售点在某国的增多或许导致该国对外政策发生某些变化(如与开放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利益集团促成这些变化;该国对美国文化至少有些亲近感的快餐食品消费者通过在选举中表达立场促成这些变化),但至今软权力的支持者们仍未能就软权力如何改变国家行为提出清晰或是可检验的理论。

最后,对于软权力的效果目前尚无系统性证据。在政府信息、非政府信息、个人联系或外国文化产品消费对个人对他国认知的不同影响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长期的专门研究。因此,所谓软权力是否真正改变了个人的认知,以及那些新的认知是否转化为与以往不同的对外政策行为,仍然没有定论。

就算我们接受一些东西可以被称为“软权力”(有吸引力的感觉、“亲近感”、对软权力拥有者的亲睦感),中国的“软权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仍非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2008年)发现,中国的软权力被夸大了。该研究认为,在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增长和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更大一致性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²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研究(2008年)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而减弱,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主导国家并没有特别地受到欢迎。³兰德公司近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对美国亚太盟国影响力已在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提升。⁴

中国在对外传递一则信息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即中国是一个可以向他国

1 "Why Soft Power Isn't So Soft: Representational Force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Att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33:3, pp.583-612.

2 www.fas.org/irp/congress/2008_rpt/crs-china.pdf.

3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Files/Studies_Publications/TaskForcesandStudies/U.S._Soft_Power_in_East_Asia.aspx.

4 Evan S.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8.

中国在对外传递一则信息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即中国是一个可以向他国提供切实可行发展模式的，和平崛起的国家。

提供切实可行发展模式的，和平崛起的国家。首先，中国模式（有时被称为北京共识）的性质是模糊的。实际上，这种模式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有没有重大意义，这些问题在中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¹ 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扩展或许能够提升中国在别国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别国对中国的理解，但是对于这类效果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研究。许多孔子学院主要是教授汉语课程，这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仅是对选修这些课程的少数学生来说。

此外，在部分国家看来，中国所传递的信息并不特别具有可信性，这些信息来自于一个由共产党掌控的集权主义政权，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发展的军事现代化。最终，造成中国“软实力”所传递的信息（如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独一无二的和平性）实际上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凸显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果。根据社会身份理论，这么做实际上会导致一种竞争性认知，而非合作性认知。²

如果人们所选择的是一种对影响力更加传统的定义，即运用非军事手段鼓励其他行为体按照施动者所愿行事，那么，关于当今国际体系中影响力的最明显的指标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对核武器的拥有。这是为何一些国家希望挤进安理会，而另一些国家希望获得核武器的原因（还有其他国家想要两者兼得）。但是，如果这两条是界定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重要标准，那么，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兴”力量，而是一个传统大国。它的影响力并没有上升，因此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力量的国家。

四、对霸权力量重大利益的威胁

关于崛起的第四个定义就是，可以威胁体系中主导国家（此处指美国）利益的不断增长的能力。那么，什么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一个跨党派的中立主义团体——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给出了一个重大利益清单。该机构认为，美国的重大利益就是“在一个自由与安全的国家中，维护和促进美国人的生存及福祉”。³ 美国的领导人、军事力量、国家声望以及同盟关系都是为了捍卫这些利益而服务的。确保美国免遭大规

1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

2 J. C. Turner,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7.

3 Graham T. Allison, Dimitri K. Simes, and James Thomson ed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2000, p.5,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58/americas_national_interests.html.

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确保美国盟友的生存，并使它们在塑造国际环境方面与美国进行积极合作；防止美国邻国中出现失败国家；保持全球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体系的活力；与其他大国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

显然，中国拥有威胁上述利益中部分利益的实力。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对美国数十个城市和 / 或美国盟国的城市造成不可接受的打击。但这并非一种新的能力，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研制和部署了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便具有了这种能力。然而，中国正在发展可以在网络空间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新的计算机网络运算能力，这种能力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的重大利益造成极大破坏。当然，正像在核领域一样，考虑到中国对全球金融和能源体系的参与程度，美国和中国在网络领域存在着一种相互威慑关系，从而极大限制了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意义。

至于美国的其他重大利益，中国现在还无法通过常规武器破坏、占领或侵入美国的主要政治与经济中心城市。中国还威胁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因为在美国国内，中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或民主并没有构成明显挑战。迄今，中国对美国人的基本经济福祉也不构成主要威胁，或者至少说，与美中经济互动相伴随的得失（trade-offs）是复杂的（如，美国的制造业受到损失，但美国维持了低通胀率，美国的高科技也获得了市场）。考虑到经济相互依赖，从理论上讲，中国的专制或高度重商主义将给国际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体系造成相当大的威胁。但在实践中，中国大体上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这些体系。

在美国的安全利益方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使美国军方产生严重关切。中国的新生的反舰弹道导弹战力和不断增强的潜艇战力在未来数年，将严重限制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并在较小程度上增加美国在南中国海保护海上交通线以及维护通航自由的成本。无疑，美国在临近中国的地区，如在航母攻击范围内，使用武力的成本在这些年已大幅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军事上正在“崛起”。

但是，人民解放军目前还没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如阿富汗、中东、中亚、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对美国使用武力进行干预的能力。总之，从军事角度而言，除了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及其网络战能力之外，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军事力量，而非跨地区力量，并且绝对不对美国构成全球性军事挑战。因此，虽然中国在亚洲这个地区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能力在增长，但中国尚不能对美国的全球军事主导权，也无法对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国家中的“美国人”的生存和福祉构成根本性的军事威胁（除了核武器，但核武器并非新近出现的）。

五、比例（Size）

上述有关崛起的几个概念经常被人们提及，但也许最经常被评论人士所提及的就是通过“比例”来量度“崛起”。然而，即便是使用这个指标，也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量度崛起，从而会使人们对目前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地位获得不同

结论。

一种可能的量度方法就是占世界权力/能力 (world power capabilities) 的比重。“战争相关系数” (Correlates of War) 项目使用了“国家权力/能力指数”¹ (National Power Capabilities Index) 来测量一个国家占世界权力/能力的比重。从这个指标看,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已经赶上了美国 (尽管这一结果受到了中国人口规模的极大影响)。这个指标意味着中国早已经“崛起”。

如果我们使用受人口规模影响较小的指标, 比如铁和钢 (20世纪军事力量的核心组成物质) 的生产能力, 那么, 中国的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崛起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了美国。

量度“比例”的第三种可能指标就是“最大落差” (largest drop-off) 规则。其要点是, 当某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差异小于该国与第二大国之间的权力差异, 该国则具备了与霸权国家进行竞争的地位。数据显示,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日本都一直是可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竞争者, 但中国时至今日仍算不上美国的竞争者。

有关“比例”的第四个指标就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与美国经济和军事能力之间的比例。从这个指标看, 中国是在崛起, 中国的GDP和军费开支分别占美国GDP和军费开支的比例, 都在提升。

然而, 对于不同的增长率的计算是会产生矛盾的。考虑到与美国的GDP相比, 中国的GDP是在一个很低水平上开始“崛起”的, 即便中国实力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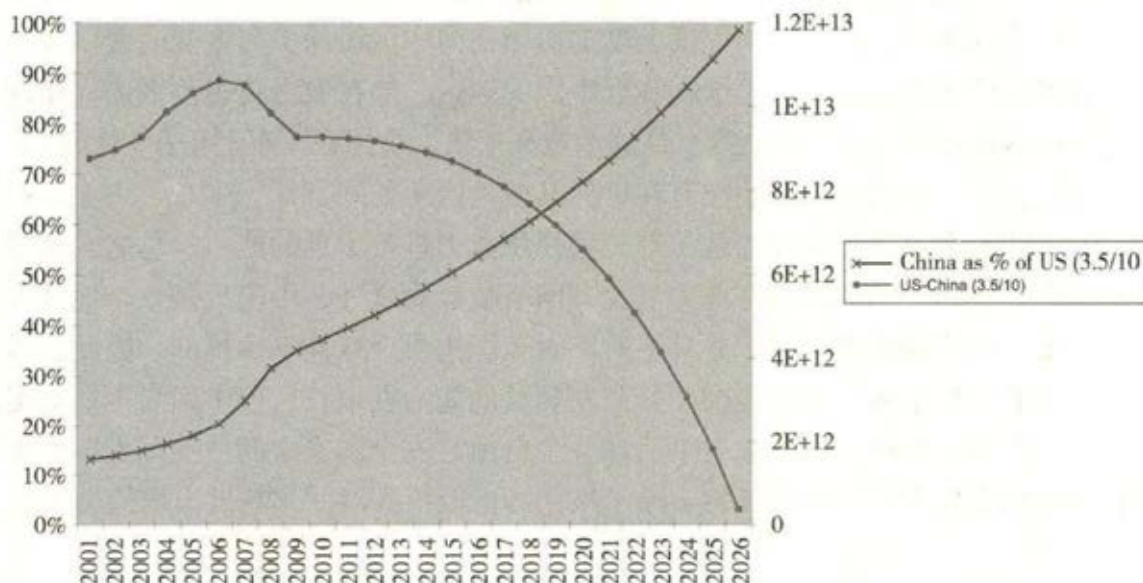


图11 美国和中国的GDP增长：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来源：世界银行）

1 这个指数包括铁和钢的生产能力、能源消费、军费开支、军队人数、人口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

实力之间的比例在上升，但直到近年，两国实力之间的绝对差异（即美国 GDP 减去中国 GDP 所得出的结果）仍一直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增长。这一点从图 11 中很容易看出，图 11 考虑到了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不同影响，并且假定美国 GDP 和中国 GDP 的未来增长率分别是 3.5% 和 10%。这些假定也许是不太现实的，尤其就中国的 GDP 增长率来说。中国的 GDP 增长率很可能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保持年均 3.5% 的 GDP 增速，在 GDP 方面美国所占据的绝对优势仍将在未来数年中得以保持。只有在那之后，中国才将会开始“缩小差距”。

这种情况在军费开支方面更加明显。图 12 显示，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例由 2001 年的大约 10% 增至 2009 年的大约 15%，但是美国和中国军费开支之间的绝对差距则从大约 3500 亿美元增至大约 6000 亿美元（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两国的军费开支都很高，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太重要。但如今看来，美国每年军费开支所多出来的数千亿美元的确可以转化为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虽然这种技术优势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分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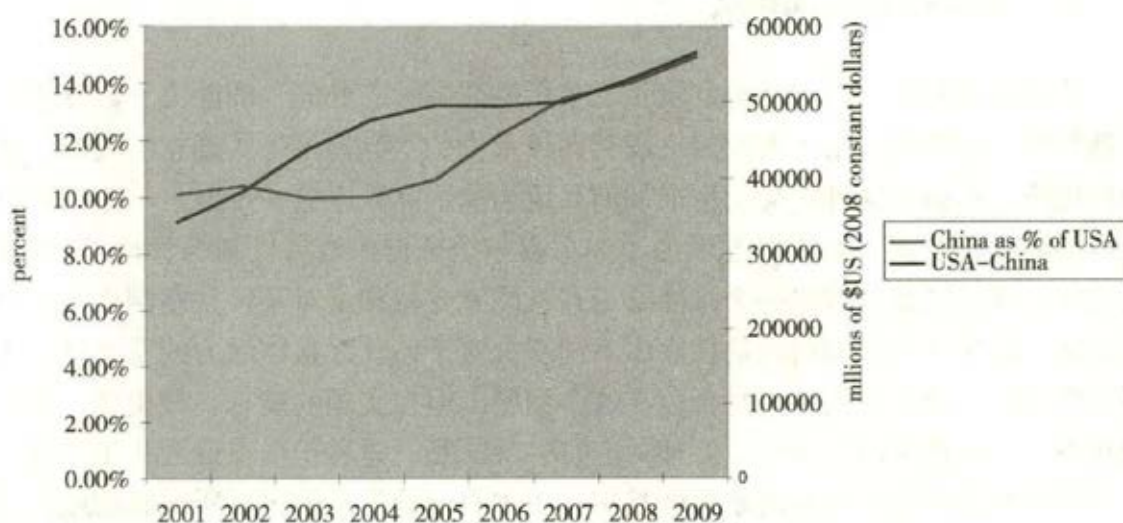


图 12 美国和中国的军费开支：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

（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0）

有趣的是，如果人们使用中国学者有关“综合国力”的计算结果，那么，从综合国力排序来看，中国并没有“崛起”得特别快（表 1）。

表1 综合国力排名¹

1990*	2000*	2006	2010
US	US	US	US
Japan	Japan	UK	Japan
Germany	Canada	Russia	Germany
Canada	Germany	France	Canada
France	France	Germany	France
UK	UK	China	Russia
Russia	China	Japan	China
China	Russia	Canada	

六、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关于崛起的第六种定义经常聚焦于某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能力，国际秩序也就是既有的霸权力量（大致为巩固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所确立的规则、机制和规范。然而，这种定义会带来如何界定当前国际秩序这一难题。一些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如主权与全球自由贸易机制的管理）。要想就国家对秩序满意度做出一个总体结论并就国家支持和反对某种秩序制出一张对比表格，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秩序中不同部分对于该秩序整体活力的重要性。先不考虑秩序（或多种秩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但在美国的确有一种担忧，即中国并不十分支持美国主导（或美国领导）的“秩序”，这种担忧在最近几年尤甚。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所谓威胁就是它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扩展所构成的威胁。正如巴玛（Naazneen Barma）和雷特纳（Ely Ratner）所言，“自由主义信条之要义在于，公民拥有相对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国际社会有责任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中国的崛起首次给西方自由主义范式带来了难以应对的意识形态挑战”。²《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或许，导致民主吸引力衰减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国的崛起，或将成为中国效仿者的那些国家相信，它们也可以在不放松对政治权力掌控的情况下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在很多专制集权国家政府的政治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它们对模仿中国做

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3年；王玲：“关于综合国力的测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

2 “China’s Illiberal Challenge”, *Democracy Journal*, Fall 2006, pp.58-68.

法的强烈兴趣”。¹

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无法明确地讲，当前朝向民主治理的趋势已遇到了重大难题。目前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仍然是非常有力的。此外，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在本国之外，中国正蓄意和积极地试图阻止或扭转这种全球趋势。²

此外，就算中国决心要对“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展开精心筹划的意识形态攻击，我们对于中国会用什么来取代既有的国际秩序也还不清楚。一种可能选择是推广儒家的价值观。但是，总体上，这种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和民主是相冲突的。前文已论及，自由主义和民主已受到广泛接受，这种情况会在全球很多地区限制儒家价值观的吸引力。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社会保守主义也不会给世界提供一种特别有新意的替代观念，因为社会保守主义早已是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非常有力的要素了。

另外一种可能选择就是，推广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在中国国内，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非常激烈。一些中国人士甚至认为，北京共识仅仅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变体。即便中国模式确有独特之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为其他很多国家提供可普遍化的、可输出的发展蓝图。

中国挑战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的最后一种意识形态方式，或许就是“和谐世界”这个理念。“和谐世界”好像是对“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和谐世界”这个理念的很多核心观点实际上早就被提出来了，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无法反映当前政府间关系的新特征；此外，这些原则并不是要挑战当前的主权国家体系，也可以被理解为想要维护既有的主权国家体系；另外，“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统领性理念，在外界看来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由军事预算位列世界第二的“崛起”的集权主义强国所表达的这种“和谐世界”话语是不足信的。

如果我们从更普遍的意义审视构成国际体系中“秩序”的既有机制、规范和行为规则（包括使用武力的条件），那么，中国的确是越来越多地认同这套秩序中的各个部分。相对而言，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比，前者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要大得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即美国支持国际秩序而中国挑战这一秩序，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和中国在对待国际机制和规范时所具有的极多复杂性。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

1 *The Economist*, January 14, 2010.

2 Gary J. Bass, "Human Rights Last,"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11,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22/human_rights_last.

支持这套秩序中的某个部分，有时两国则都反对这套秩序中的某个部分，有时其中一国对这套秩序中的某个部分提出挑战。

结 论

显然，对于崛起力量的不同评估指标会使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性质、速度和意图得出不同的结论。表2是对这些不同结论的概括。

从历史、能见度、比例以及影响力这些角度看，中国正在“崛起”，尽管在部分情况（如能见度和影响力）下，这种崛起是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开始的。

从对霸权力量重大利益的威胁这个角度看，有关中国崛起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领土完整构成强有力的、新的威胁。

从传统力量要素的绝对水平来看，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非常明显的是，从军费开支看，美国在物质力量及能力上依然维持绝对的优势地位。

从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个角度看，中国对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规范和机制是挑战，是接纳，还是处于两者之间，仍然说不清。当今中国的行为，与毛泽东时代的“修正主义”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但至于中国的行为对现存秩序所带来的挑战，则是众说纷纭。

表2 “中国崛起”：不同定义得出不同答案

Definition of “Rising”	Is China “rising”?
Historical	Yes
Visibility	Yes
Influence	Yes (limited?)
Threat to hegemon’s core security interests	Unclear
Size	
<i>as a proportion of hegemon’s power</i>	Yes
<i>closing the absolute gap in the hegemon’s power advantage — “catching up”</i>	No (not yet)
Threat to hegemon’s order	No?

然而，关于“崛起”还有第七种定义：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崛起”，即不管上述有关“中国崛起”的话语存在什么定义上的混淆和思维上的不严密，事实上，

所有人都同意中国正在崛起。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曾言:“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向中国快速转移,这种转移的确是不寻常的。”索罗斯还认为,“美国的衰落堪比二战后英国的衰落”。¹ 皮尤中心进行的民调显示,几乎一半的美国受访者相信,中国的经济要比美国的经济更有力量,尽管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中国的三倍。²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之外,有关“崛起的中国”的论述显然也在“崛起”(图13)。对“中国崛起”的兴趣不断增长的一个指标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在谷歌中进行的有关中国的检索与有关美国的检索相比,前者所占的比例在上升(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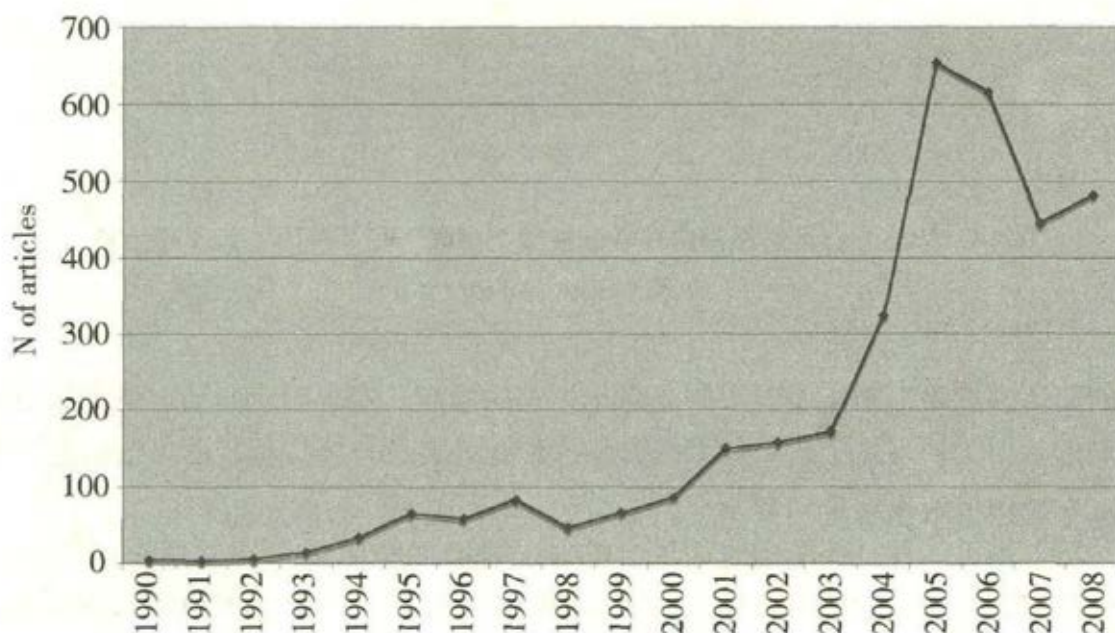


图13 美国新闻报道中提及“中国崛起”的频率
(来源: LexisNexis General News)

中国这个案例表明,作为一个具有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e) 的现象,如果对于某国正在崛起有普遍认知,那么,不论物质能力和影响力方面的证据如何,这个国家就是正在崛起。这种现象会对美中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施加有趣的影响,与某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相比,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会为我们展现一组更加不确定的未来景象。

简言之,至少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双方都认为中国的确在崛起。这便会引发一种严重的安全困境,美国会采取旨在捍卫霸权地位的外交和军事战略,中国则会采取它自以

1 *Globe and Mail*, Nov. 15, 2010.

2 <http://pewresearch.org/pubs/1855/china-poll-americans-want-closer-ties-but-tougher-trade-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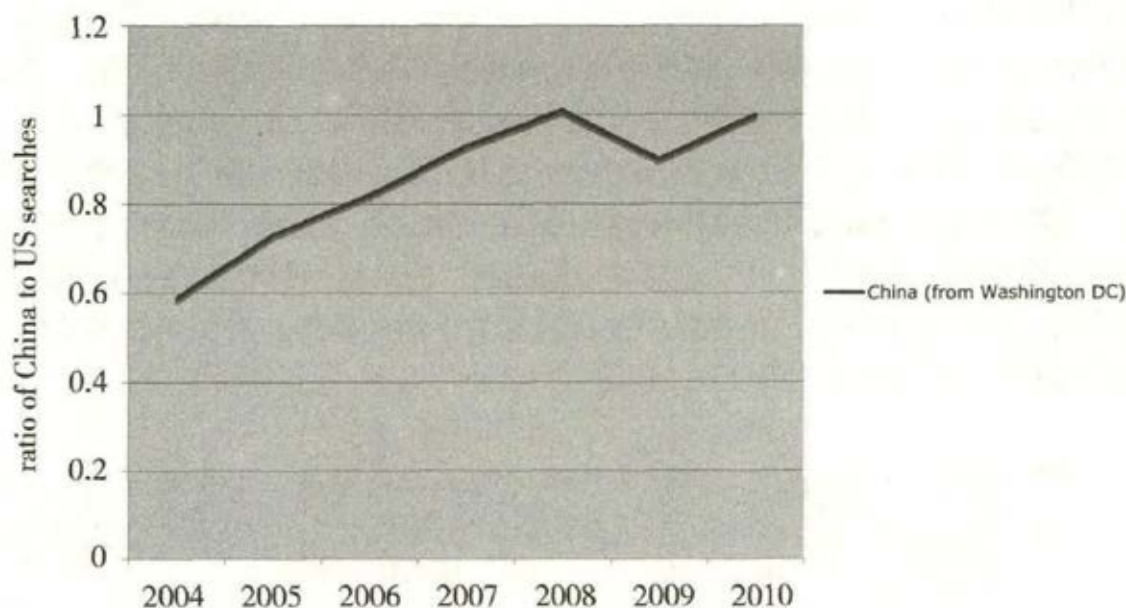


图14 华盛顿特区网络用户在谷歌搜索“中国”和“美国”频次的比较
(来源: Google Trends)

为的防御性战略以防止美国限制或阻止中国的崛起。安全困境的动力是很难受到抑制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如果双方能够传递各自愿意维持现状的可信信息,那么,安全困境就可以得到控制。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崛起,而中国领导人则不这么认为。这会导致,美国以管控它所认为的中国崛起为目标而行事,中国领导人则因为中国所处的脆弱地位而做出过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把美国方面的强硬动作视为一种旨在压制中国未来发展和安全的、无理的切实威胁。与两国都认为中国在崛起那种情况不同,在这种可能性之下,任何一方想要就满足现状做出可信的表态,都将是更加困难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美国领导人并不认为中国力量大幅上升,而中国领导人则相信中国的力量的确在崛起。继而,中国可能会认为,美国在有意或无意地拒绝给予中国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如此一来,地位上的不相称所带来的那种动力,会促使中国做出进一步努力,运用自身力量的增长,来缩小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当前获得的地位之间的差距。有多个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的相关数据表明,地位上的不相称会使行为体更加偏好权力政治(realpolitik),并更倾向与挑起冲突。

第四种可能性是,两国都不认为,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力量在崛起。对于美国来说,这将表明,中国对于不对等的权力分配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意味着,美国愿与中国共处,并接纳中国的内部政治体系和外部利益。当然,这将是一种最良性的结果。

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中,哪一种最有可能在未来数年中主导两个国

家的决策过程。对双方有关中国崛起的话语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一种可能性比其他三种可能性,最符合当前美中关系的现实,尽管中国在自己的话语中对“综合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表明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也是存在的。

最后,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如何界定和运用“崛起”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媒体、智库、学者和领导人如何界定、量度和评析“崛起”(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将对他们就中国崛起是否存在、崛起的速度如何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崛起所得出的结论产生直接影响。话语的确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意义。

(赵明昊 译;江忆恩 校)